

18日,在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大会上,党中央、国务院授予100名同志改革先锋称号,颁授改革先锋奖章。在这份名单里,著名作家蒋子龙作为“改革文学”作家的代表,受到表彰。蒋子龙是“改革文学”的开创者,他用一篇《乔厂长上任记》,将改革文学深深地烙在当代文学的史册上。他始终把创作的着眼点放在人们关心的改革领域,其作品致力于改革者形象的塑造,对引领思想观念转变、推进改革实践产生了重大影响。

——编者

重磅荐读

2 在创作高峰期转向,十年铸剑书写农村变革

1982年年底,写完短篇小说《拜年》,蒋子龙在自己工业题材小说的创作高峰期,放下了工业题材小说创作。他在《“重返工业题材”杂议——答陈国凯》一文中写道:“当时我感到自己成了自己无法逾越的疆界,我的工业题材走投无路。它不应该是这个样子,它束缚了我。我受到我所表现的生活、我所创造的人物的压迫……我需要暂时与工业题材拉开点‘历史的距离’,对工业生活及自身进行一番感悟、自省和玩味。”这是蒋子龙作为一位清醒的作家的可贵自省。

大约从1984年开始,连续五六年的时间里,蒋子龙努力尝试着摆脱自己的创作模式,打开自己的文学视野。他明确提出,文学不应该以题材来划分,作家不应该被题材所局限。在这段时间里,他写下了以医生郭存先为主人公的长篇小说《蛇神》和以《收审记》为代表的“饥饿综合征”系列小说。这一阶段对蒋子龙来说,是至关重要的,他突破了最初使自己成名的风格与题材的束缚,打开了一片更为广阔的文学天地。

经历了这样一次涅槃式的文学重生,蒋子龙的心境进入一个崭新的境界,他不再想驾驭文学,而是“心甘情愿、舒展自如地被文学所驾驭”。这个状态的蒋子龙,即将迎来他一生中最为艰苦也最为重要的文学书写。

如果你问蒋子龙对自己的哪部作品最为看重,你会得到这样的回答:不是一纸风行的《乔厂长上任记》,也不是更早发表的《机电局长的一天》,更不是后来创作的《一个工厂秘书的日记》及《人气》《空洞》等作品,而是他于2000年之后开始创作,历时11年写就的《农民帝国》。《农民帝国》这本书,传递了蒋子龙对于农村生活变革与农民文化性格的深刻思考,也折射了他深入骨髓的农民本色与一生都挥之不去的浓烈乡愁。

为了写《农民帝国》,蒋子龙去农村待了很长时间,他有意让自己重新变回一个农村人,在一种农村的天然氛围里写作。广东的农村、河南的农村、山东的农村、天津周边的农村,都一一留下了蒋子龙的足迹。

《农民帝国》的主人公郭存先,本来是一位善良勤劳、精干有为的农民青年,带领村民脱贫致富,取得了事业上的辉煌成功。就是这样一位有本领、有志向的农民,却在取得成功之后,个人私欲无限膨胀,由农村的带头人迅速蜕变成农村的统治者,最后自取灭亡。郭存先这个人物,在现实生活中是有原型的,蒋子龙说,写小说虽是虚构,反映的却是现实世界,表达的更是对现实生活的思考。

3 文学是生活结出的花朵,真实是文学最美的颜色

回顾蒋子龙的文学生涯,有一个特别有意思的现象:他的几乎每一篇作品问世,都会给他带来冰火两重天的待遇,或者说,都会引起社会上的一次甚至数次争论。从《机电局长的一天》发表,一直到《农民帝国》的出版,蒋子龙经历了太多的风风雨雨,而他的文学创作就在这样的一次次锤炼与磨砺中走向成熟。

在写小说之外,蒋子龙还致力于散文与散文的写作。散文是针砭丑恶、张扬美善的文体,讲究的是观点鲜明,短小精悍,刺刀见血,这种干脆利落、是非分明的文体,与蒋子龙的性格简直有着天然的契合。他以散文为阵地,对各种社会问题表达着自己的看法,嬉笑怒骂,皆是文章。散文则是一种较为舒缓的文体,却极有利于作家情怀的抒发与志趣的伸张,在进行长篇小说创作的同时,蒋子龙写下了大量的散文随笔,读这样的篇章,我们可以看到一个更感性、更立体、更丰满的蒋子龙。

不管写什么,工业题材也好,农村题材也好,城市题材也好,也不管怎么写,浪漫地写也好,现实地写也好,魔幻地写也好,唯一能告慰读者的,只有真实,即便是虚构的故事,里面却须有真实的世界。蒋子龙把他的文学观念,牢牢地定位在了“真实”两个字上:真实的世界,真实的困难,真实的人物,真实的感情……蒋子龙说:“我相信,任何读者的心,都能够向真实洞开。”

通身流淌着农民的血脉,毕生在文学的道路上锐意突破,以全部的文字求真求实的作家蒋子龙,以自己的人生经历与文学作品,描绘了当代文学史上另一道别具亮色的风景。

据《人民日报》(海外版)作者:张健

改革先锋 蒋子龙

不是我选择了改革 是改革选择了我

人物档案

蒋子龙,男,汉族,中共党员,1941年8月生,河北沧县人,天津市作家协会名誉主席,中国作家协会第五、六、七届副主席。他是“改革文学”的开创者和代表性作家,其作品致力于改革者形象的塑造。他1979年创作并发表短篇小说《乔厂长上任记》,开“改革文学”先河。他始终把创作的着眼点放在人们关心的经济改革领域,以雄放刚健的风格,把改革者的个性心理、精神风貌及为现代化建设进行可歌可泣的奋斗表现得极具感染力。他陆续发表的《开拓者》《赤橙黄绿青蓝紫》《锅碗瓢盆交响曲》等一系列表现工厂、城市改革的中短篇小说,对引领思想观念转变、推进改革实践产生了重大影响,激发了全国上下的改革热情。其多部作品荣获全国优秀短篇、中篇小说奖。

蒋子龙回忆: 《乔厂长上任记》3天就写成了

“乔厂长”的轰动效应

《乔厂长上任记》讲述了“十年动乱”之后,某重型电机厂生产停顿,人心混乱,老干部乔光朴主动出来收拾烂摊子,大刀阔斧地进行改革,从而扭转工厂被动局面的故事。蒋子龙说:“《乔厂长上任记》的创作过程非常简单,简单到不是我找到了乔厂长,而是乔厂长找到了我。当时我只花了3天时间,就写出了这篇小说。”

蒋子龙在回忆中提到,1977年后,他在重机厂的锻压车间任主任,那时候他攒足了力气想好好干事,却发现有用纸没材料,好不容易把材料找齐,可是机器设备年久失修,到处是毛病,等把机器修好了,人又不听使唤……他感觉自己天天就像在“救火”,这就是他创作《乔厂长上任记》时的心境。这篇小说,实际上就是写他自己一段时间以来的苦恼与理想,写如果让他来当厂长,他会怎么干。

《乔厂长上任记》开辟了中国工业题材小说的新局面,被公认为是中国“改革文学”的开山之作。小说发表后,引起社会强烈反响,作者收到近千封读者来信。大刀阔斧、锐意改革的电机厂“乔厂长”成了改革者的代名词,有工人买一本《人民文学》送给自己单位的厂长,希望厂长像乔光朴那样领导工人干“四化”。小说获得1979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第一名。1980年,小说改编成电影《钟声》。同年,同名电视剧播出,著名演员李默然在剧中扮演乔光朴,同样在全国引起轰动。

“乔厂长”也曾挨批

蒋子龙回忆,《乔厂长上任记》发表后,曾有报纸连续发表了14个版的批判文章,一位作家在报纸上发表了声讨长文后,还带着介绍信到工厂查蒋子龙的老底,看他历史上有没有什么问题……

1979年10月底,全国第四次文代会在北京召开,那是一个文学的庆典,象征着一种结束,也是一种开始。在开会前一周,当时的中央领导人为《乔厂长上任记》作了批示,大致意思是“蒋子龙同志的小说《乔厂长上任记》和《后记》我认为写得很好,天津市委的一位同志给我写了一封信,说《乔厂长上任记》有什么缺点错误,我回了他的信。我说,整个小说是好的,怎么说也是香花,不能说是毒草;说有缺点,那也是有缺点的香花”。于是蒋子龙有幸参加了全国第四次文代会。

蒋子龙在回忆录中反思说:“为一篇小说惊动了这么多人,其实这并不是单纯的小说事件,它触发了时代潜在的历史情结,有着更为复杂的社会性。小说不过是碰巧将历史性潮流和历史性人物结合在一起,造成了一定的社会轰动效应,并不是作者对生活和艺术有什么了不得的发现。”

(据《福州晚报》作者:顾伟)

蒋子龙 (资料图片)

沧州地处河北省东南部,是蒋子龙的故乡。14岁之前,蒋子龙的生活在沧州农村度过,那里高高的土房,比两边的土地矮一大截的车道、村子外面的大水坑,以及在水坑里摸鱼洗澡的日子,都深深地烙在了他的记忆里。蒋子龙走过的地方很多,其中很多地方都比沧州富饶、美丽。但是,这个普普通通的沧州

给了他巨大的触动与滋养,他把沧州当作了一生中最重要的精神根据地。虽然蒋子龙是以工业题材小说在文坛上闯出一片天地的,但是他骨子里是一个农民,他在很多场合都一再强调这一点。他的农民本色,是沧州给他染上的,他磊落豪直的性格,庶几与这片土地脱离不了关系。

1 当改革开始激荡生活,作家的创作之火随之点燃

不管愿不愿意,理不理解,文学都成了蒋子龙的宿命,带给他荣光,也带给他艰难。很多人都问蒋子龙,当初为什么要选择创作工业题材小说?蒋子龙感叹地回答:“人的一生总会碰上那么几次鬼使神差、歪打正着的事情。‘人’字是由两根棍子斜搭在一起构成的,也就是说,一个人的命运要由别人横插上一杠子才能完成。”

从某种意义上说,蒋子龙的创作就被这样一种莫名的力量推动着往前走。1975年秋天,全国“工业学大庆”,掀起了一股“抓生产”的潮流。那时候,国家第一机械工业部系统学大庆会议在天津宾馆召开,蒋子龙所在的天津重型机器厂是一机部所属的大厂,蒋子龙作为厂子的代理工段长,参加了会议。就是在这个会场上,《人民文学》的老编辑部主任许以找到了蒋子龙,告诉他,毛主席亲自下令,停刊多年的《人民文学》要在1976年复刊。许以希望蒋子龙能够为复刊的《人民文学》写一篇小说。碰巧的是,那个时候的蒋子龙正被大会上一些先进人物的生产事迹所

感染,觉得有很多话想说。于是,就在开会的宾馆里,他没日没夜地写了起来,由此有了短篇小说《机电局长的一天》的诞生。

三年后,1979年,蒋子龙又在《人民文学》上发表了短篇小说《乔厂长上任记》,这篇小说影响更大,在当时产生了“轰动效应”,也使“蒋子龙”这三个字从此烙在了当代文学的史册上。小说塑造了改革家乔光朴的光辉形象,被认为是“改革文学”的开山之作。

后来,在不同的场合,蒋子龙都会被人这样提问:作为“改革文学”的缔造者,作为工业题材的代表作家,您如何如何。每当这时,直爽的蒋子龙就会实话实说:“其实我至今也搞不清楚‘改革文学’的概念,作家是不可能按照‘改革’的定义去创作文学作品的。而只有当‘改革’实际上成为人民群众精神生活与物质生活的主题时,正在剧烈地摇荡与改变人们的生活方式时,才能让作家把激情和材料融合成创作之火,把虚构的人物和故事融于真实的生活旋律之中。”

本版转载文章作者,请联系编辑(电子邮箱:lyrbshb@163.com)告知地址,以奉稿酬。

